

读者参考

丛书

114

被科技盗去的光

◎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上限与下限 ◎我国“教育不足”与“过度教育”并存

◎外国人如何看“剩女” ◎“小时代”的不能承受之轻

◎年轻人为什么一定要买房

DU
ZHE
CAN
KAO
CONG
HU

出版社



读者参考

丛书

1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科技盗去的时光 / 《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编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3. 12

(读者参考丛书 / 林雨主编; 114)

ISBN 978-7-5486-0569-0

I. ①被… II. ①读… III. ①文摘—中国 IV.

①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4675 号

本书资料除编者据各种资料汇编而成的文字以外,所用图文资料均标明出处及作者。转录图文均酌付稿酬。有未及奉达者,请即与我编辑部联系。

被科技盗去的时光

读者参考丛书(114)

2013 年 12 月出版

编辑:《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

执行主编:林 雨

责任编辑:天 水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版: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邮政编码:200235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邮购: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电话:021-64084572

地址: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邮政编码:200235

印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印张:8

字数:28 万

ISBN 978-7-5486-0569-0/Z·40

定价:16.00 元

读者参考丛书
(114)

被科技盗去的光
目录

国力上升期需要精神成熟	1
中国——不完全的大国	10
秦晖：重申转型期的正义	16
中国迈向海洋大国是历史性转型	20
阎学通：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14
中美关系解冻中的“日本牌”	22
叙利亚战事与中国	25
李光耀畅谈美日欧未来走向	27
五问中国宏观面	33
上限与下限	39
期待自贸区再创制度红利	44
城镇化或难成经济增长引擎	46
算一算，你可成为哪国中产	197
警惕“零散税”背后的“大文章”	47
国内居民资产错配严重	54
理财产品灰幕	50
新股发行改革无突破	55
被出口的好股票	61
股票不适合普通人投资？	48
房产税：国外怎么收	65
任志强：现行保障房制度容易滋生腐败	75
每年新增土地有多少用在住宅上	60
年轻人为什么一定要买房	77

现代社会,何处觅真爱	83
外国人如何看“剩女”	87
周扬父子:我们从未走进彼此的内心	80
“俗人”释永信	92
张曙光的“院士梦”	96
慢生活	100
社交“潜规则”	106
复杂拼不过简单	108
“造城盛宴”再遭警告	109
谁的天空	63
中国式缺药:消亡的他巴唑	90
我国“教育不足”与“过度教育”并存	113
众多大学生不具备雇主需求技能	119
职场中不该说的 13 种话	111
被贴上标签的李娜	117
音乐家眼里的瓦格纳	120
“古典音乐世界的一切都在迅速变化” ——专访诺曼·莱布雷希特	126
晚会是怎么“烧钱”的	128
影评腐败	31
韩少功:走出“狂欢下的废墟”	130
叶兆言:现代文学确实没那么好	137

当我们还年轻	142
“大”与“早熟”	
——梁漱溟谈中国文化的秘密	144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错在哪里	150
走近“乔布斯们”的书房	153
商业“大佬”们爱读些什么	104
 以世界公民的眼光看未来	158
“小时代”的不能承受之轻	165
保留和创造未来的故乡	168
从农村到城市	170
 法官受贿别只怨不良律师	173
为什么企业家要参与法治建设	175
“棱镜事件”的法律解读	177
 被科技盗去的时光	74
微信如何商业化	180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印象	156
天空中的“暗算”	186
无人潜艇将“改变游戏规则”	189
 凤凰灯红酒绿,但翠翠早已跑掉了	
——阮仪三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误区	190
鄂尔多斯的富豪	76
转战文化产业:温州“闲钱”寻出路	195
 2013 两岸关系:呈错位发展之势	202

中国与欧美,差距究竟有多大	174
隐身中国的世界富豪家族	207
“洋媳妇”这样评价中国男人	209
中国人的几大习惯让老外看不惯	136
中国进口车为何全球最贵	94
买一个汉堡多少钱	212
 国外生活成本有多高	 179
世界人民的早餐	42
美国情报机构知多少	238
俄罗斯的强人情结	210
底特律走向破产启示录	213
德国有份“阳台守则”	221
游走苏格兰	241
设计大国的性格	222
“大胃口”的贝瑞特	226
 我国垄断范围日渐扩大	 164
“戒狠”须先解除对不公强权之“恨”	49
为退休政策献计为何总盯着“延迟”	231
“中国很复杂”不是拒绝批评的借口	21
“沉睡的规定”背后是脱离群众	9
风水师称生意多来自官员	172
贪腐官员“失踪”调查	123
“卖掉”北京的地能换美国一年 GDP	167
 什么是安全的转基因食品	 218
吃水果的时间问题	232
被医生吓死的病人	235

“过时”医嘱不必听	245
为什么医生只相信机器	244
四成胃癌在中国	224
好药能治病也会害命	107

生物钟是座什么钟	152
小心三种心理衰老	24
号称纯天然的植物染发剂其实有毒	38

啤酒的千年“苦恋”	114
禅宗的起源	102

今日说法

封面图片 王崑的火车人生

摄影:黄崑 文见第 99 页

国力上升期需要精神成熟

8月25日,著名时政评论员、学者、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邱震海做客第64期文汇报讲堂,主讲《国力上升期的精神成熟》,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受邀出任对话嘉宾。

处于国力上升期的中国民众,对外,有大国梦下的激情和“失土必争”心理;对内,有社会各种矛盾带来的标签化和情绪化,整个社会处在内外联动的茫然中。

非常感谢《文汇报》,今天是回“娘家”。25年前的今天,是《文汇报》国外记者部编辑给我的约稿信鼓舞、栽培我走上了新闻的从业道路,1990到1997年,我从波恩给《文汇报》写稿;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问题分析是我的所长。1997年,香港即将回归,我本能感到和1990年在德国经历的两个体制融合完全不同,后者是一个体制被另一个体制合并,但香港回归是人类前无古人的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体制的融合。在东亚发生的一切,对立志做学者型记者的我来说更有吸引力,便放弃在德国的一切回到香港。

1999年,并没有想到中国会崛起,没有想到中国崛起会给世界造成如此大的政治、经济乃至集体的冲击。19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十年内,我关注的重点开始转向周

边热点、两岸关系、朝核风波,那几年,中日关系燃起熊熊大火,中美关系始终是重中之重。

慢慢地,我们发现自己开始茫然。1999年美国所谓误炸中国大使馆,有些青年激愤地发出“中国可以说不是”的声音,但不久我发现:砸成都美国领事馆窗户的青年在美领馆门口排队等签证——西方对中国来说,到底是强盗还是老师?1979到1989年,中国在西方眼里是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对中国非常友善,但现在,原来的朋友渐渐成了对手,是我们变了,还是他们变了,还是我们中间很多关系变了?我称之为茫然。

去年从白云机场坐的士到市中心,途中我和司机聊天,他说喜欢看节目中的打仗专题,理由是“我一无所有,假如不打仗不会重新洗牌”,最后说今天中国底层有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这句话让我沉默。仔细想想,今天中国的诸多问题,如同医学上的“良性并发症”,表面看是外交军事问题,其实是内

外联动性的茫然：对外，是面临中国崛起时的“失土必争”心理和大国梦下的激情；对内，是转型期的种种社会矛盾带来的标签化和情绪化。

从历史中学做智者，和德国、日本一样，中国也是后发展国家，没有经过充分的思想启蒙，我们习惯以革命解决旧体制问题，只有邓小平用和平的改良促成了发展。

历史是一种智慧，一个人、一个民族或者人类整体，如果不能从历史当中学会一些东西，可能未来会很茫然。德国人说，世界上只有三种人：正常人能够从自己的错误道路上学会正确；最聪明的人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会正确；最愚蠢的人，自己犯过错误，还不断犯。不反思历史，我们常会成为第三种人，往往会不知不觉地犯外在表象不同、内在逻辑相似的错误，有时乐在其中或亢奋其中。看过去 150 年国人走过的路，无论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还是国共仁人志士，难免走了好多弯路。

今天我们做国际时事评论，除了解释事实，还要预测未来。所以我提出一个观点，一个民族可能有很多种历史：政治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教育史、外交史、军事史，但常常会忽略精神史或者思想史。整个社会大到决策者，中到精英智囊乃至媒体人士，低到普通老百姓，人们都是这个时代的工程师和设计师，我们有什么样认知水准，就能做出一个怎样的国内产品和国际产品：国际产品决定怎么和世界

相处，国内产品决定未来 50 年走向何处。有观点说问题很多，要倒退到 1978 年前，因为那时没有贪污等；有观点说，我们要用最极端的方法来改革。但如果今天人们不具备成熟的认知水平，我们未来的路依然会很茫然。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其实真的到了精神十字路口，这些促使我思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国力上升期需要精神上的成熟。

德、日都是后发国家，高速发展时，所有的市场都被别人占了，无形中有一种追快的心理；与英、法相比，在崛起乃至崛起结束，它们都没有完成启蒙，甚至都没有开启过思想启蒙进程。换句话说，玉不琢不成器。我觉得我们国民非常善良，从过去的臣民到今天的顺民，就是没有经过公民进程的雕琢。以西方概念来说，所谓思想启蒙浪费了或者错过了。比如五四运动，民族在衰败期精英阶层有焦虑，会变成茫然和骚动，茫然到最后我们的传统文化都可以不要了，从抛弃器物到制度最后到文化。假如我们精英阶层在当时有一定韧劲一定理性，说不定可成就一番大事，然而没有，最后被革命浪潮所吞没。

所以，我们自然要追问，中国人精神意义上成熟吗？过去 150 年可歌可泣过程中，不同药方拯救同一个祖国，像两三个外科医生用不同手术方案给病人开刀，手术方案可以讨论，即使中医西医也可以兼容，但我们只有排他性。讲到革命和改

良问题,只有邓小平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的铁定律,无论商鞅变法、戊戌变法,都是推翻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很少有妥协,遵循游戏规则,进行建设性斗争而非对抗性斗争,几乎没有。而邓小平改革开放,在我看来有令人自豪的三大特征,第一,和平,将一个旧模式嫁接一个新模式;第二,以富国强兵为载体;第三,追赶西方。

现代化有三个层面,物质、制度、精神。中国当年败给日本,是因为中国没有完成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日本现在走向右倾,是因为它没有完成精神层面的现代化。

从历史来看,中国和日本同时开始现代化进程,中国是洋务运动,日本是明治维新,都是被外力所迫,选择路径也是相同的富国强兵追赶西方。但日本成功了。

为什么中国会败给日本?我认为,现代化有三个层面:物质、制度、精神,当然不一定分绝对先后。当年北洋海军基建在亚洲属一流,但日本人看见清军士兵将洗完的衣服晾在炮筒上,立即预言这支队伍必然失败,因为它没有现代化管理。电影《甲午风云》中,邓世昌发射炮弹,有的竟然是沙子,军款都被贪污了。这背后是体制问题。然而体制又来自何方?我们寻找过很多体制,有过诸多左右之争。我们也许太多寄希望于科学家来解决物质现代化的问题,而忽略了同时期的知识精英去思考物质背后的更内在一

面。但物质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三分之一,还有制度现代化,保证物质现代化需要一个基本框架,它就是一个制度,但是这个框架我们一直没有找到。

日本明治维新后,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已经基本完成制度现代化:完成了企业制度的现代化和国民素质的现代化,这是一个重要挑战或者转型过程。日本思想家福泽早年提出“振兴大和民族”,类似今天中国提出“中国梦”,非常正面,但到了晚年,当1895年日本把中国打败,他给朋友写了一封信,“我为我们打败清国而热泪盈眶”。一位日本民族精神领袖,晚年发出这样的喟叹,不难看到他的精神轨迹发生了变化:从早年的爱国主义者到晚年的帝国主义者,中间只有一步之遥,虽然一步之遥跨越了十年三十年,这一步却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从甲午海战打败中国——曾经的老师,到1895年打败俄罗斯,日本人是何等自豪,这是一面严重扭曲精神的旗帜!福泽说:“我们是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我们还要领着所有亚洲国家抗衡白人统治。”然后他用的所有手段全是帝国主义式的扩张。你不能否认其内核里有0.001%的合理元素,有为振兴民族的悲情所裹胁的抗争。但这0.001%的合理成分被99.9%的军国主义所侵吞。所以说,日本的精神层面并没有完成现代化。所谓的思想启蒙也好或者反思历史进程也

好,日本和德国完全不同,它对历史反思不清醒不彻底。因为它的天皇体制还在,而德国的希特勒体制已经不存在。

2004年我到日本考察12天,我在靖国神社里看了描述当年军国主义如何兴起的纪录片,陪同的女翻译是位“亲华派”,她居然表达了“没有这些先烈,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的意思。我无语,那些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逻辑最内核永远是爱国主义,外面层层包装:先是极端民族主义,然后殖民主义。在批评日本人的很多盲点时,我们要反思中国自己。在今天我们崛起期是否也会犯表象不同、本质似曾相识的错误?

一百多年前,前辈知识精英因国力衰败而焦虑,而今天,国力崛起,是否又过分自豪?所以亟需呼唤国民精神成熟。

反观中国自身,我们如何和世界相处?一个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必然有困境,按照国际学者的观点:安全困境到底是自己认定,还是确有其事?西方话语中会有“半杯满半杯空”的说法,就是不同视角有不同解读。

今天中国崛起,周边有安全困境,譬如能源短缺:1993年石油进口,2009年开始天然气全部进口,从明年起石油对世界依赖将超过美国。我们周边海洋困境也很多。但从“半杯空”的角度看,今天中国安全困境有19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

时,美国包围中国那么严重吗?有苏联屯兵压阵东北那么严峻吗?今天所谓战略困境是一种伪问题,是我们自己认为的“半杯满”,我们完全可以和世界和平相处。当然今天中国已经变了,已经从提携者变成一个竞争对手。不但从意识形态而且从战略利益,从国家规模国力竞争上相互竞争。但是不是要互相竞争升级?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一模一样,你恶他也不友善,你善他也难以恶,至少从公关层面也是可以相互感染的。

国内问题也是如此。用我的话来说,精神层面上还有待于成熟。过去150年历史当中,坦率讲有很多改良问题,被我们很急躁地用革命问题去改造。

我刚才高度评价了邓小平35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颠覆了我们只会革命不会改良的传统。过去30年没有革命,基本上清除了思想暴力、语言暴力、制度暴力。我们第一次学会了和平、理性地解决问题。听上去有点可悲,但我认为在中华民族历史长卷上是很了不起的。1980年代,中国是“牧歌般行进”的现代化,物质很贫困,心灵很开放,对未来充满希望;到了1990年代,物质渐丰,人们不太关心国家走向,开始埋头赚钱,无可非议地满足赚钱这种动物般的本能,心灵开始变得封闭;又过了十年,物质更丰,心灵却开始茫然,因为我们与西方关系茫然,最关键在于精英阶层开始

茫然了。今天中国发展到现在,很多种力量同时角力。第一是商业力量,很多民营企业,资本力量是无穷的,只要有资本就能做好事也能做坏事。第二是知识力量。第三是公民力量,今天的微博在惩治腐败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正能量传播上,也不可小觑。第四是政治力量,有进步的、有保守的、也有茫然的。第五是法制力量。但是很重要的是前三股力量:资本力量、知识力量、公民力量。

我对第二种知识力量寄予希望,因为中国知识精英还没有发挥出有效的独立思考和正确的引领作用,只是把无奈归咎于政治权力的钳制。当一百多年前,前辈知识精英因国力衰败而焦虑,变成茫然变成骚动时,他们没有时间和耐心去启蒙,只是赶紧选择革命以求得一劳永逸。而今天,我们国力崛起,是否又过分自豪,一不小心走向自负,再走向傲慢,但背后依然是焦虑茫然呢?所以,今天谈这个问题很沉重。因此,也亟需呼唤我们国民的精神成熟,呼唤知识精英发挥作用。

我们需要通过培育公共讨论文化,来建立理性的思维,以此稳健地走向民族未来。而健康的公共讨论,应当穿过政治主义之争,抛开情绪之扰,直达问题的本质——逻辑。

当我做出那么多评价,最后要问:走向成熟的路在何方?我觉得,今天中国的知识精英应大量整合、梳理目前民众已有的情绪和该有的

精神状态。今天既不可能希望政治权力赐予无限自由,也不可能寄希望思想启蒙的重新来过。我们生活在21世纪,公共空间已经形成。网络、微博、今天这样的讲座形式,都已表明公共空间已经形成,然而公共讨论没有形成。所以我提出:今天的中国有健康的公共讨论吗?我认为没有。这个公共讨论受到的限制很小,很多是被自己浪费和滥用了。像网络语言“用核武器铲掉日本”,就是滥用了公共讨论和自由空间。今天中国只要从知识阶层开始做起,学会建立一种好的讨论文化,折射在我们的电视节目里面,折射在媒体视野里,折射在公共空间,也折射在每个公民的讨论中。我们学会讨论学会谈话很重要。人的讨论有三个境界,最外层可能是政治立场,谈一个问题,不同药方;下一个层面,人的情绪。我们用人性的话来说,谁没点脾气。一个民族当然有脾气,这是情绪,但是情绪是茫然的,是一块没有经过雕琢的石头。我们的知识精英包括媒体人士、学者在引导民众思维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跨越情绪,进入到下一个逻辑层面来思考问题,逻辑就是问题本质,没有主义之争,剥离情绪直达问题核心。比如,我是学者,就只有一个立场——我的学术良心。一旦进入到逻辑层面讨论问题,我们会冷静下来,不会吵得那么非理性。

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不是那么容易标签化。当我们不再标签化

时,我们会正视对方,你说的不是全有道理,我的也不是全有道理。其实这是非常简单的讨论问题或者思考问题的方式,但是我们需要学习需要建构需要培养,由此从感性走向理性。如果大家能够逐渐形成这种氛围,就可能促使民族在未来通往稳健之路,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弯路。对此,我充满信心。

民族成熟与否对民族 主义的泛滥有警示作用

萧功秦:今天的题目很有意义。当一个民族处于国力上升期时,如果没有经过启蒙理性的培育,突然发展起来后,会面临很多困境。首先要解决的是国民精神成熟的问题,这样的视角恐怕是邱先生第一个提出来的,即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平或者工业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与这种物质文明相对应的精神文明,是不是能够协调地发展起来。我们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但现代化的过程还非常短暂,我们还需要一个现代国民精神的成熟期。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一方面确实是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好的时期,但另一方面,民众的心理和精神的成熟是相对滞后的,整个社会缺乏理性思维的氛围和能力。由于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的存在,不少民众心理中有挫折感,这种挫折感很容易转化为一种充满焦虑和激愤的心态,在发生国际冲突的情况下,在种种因素作用下,会演变成

一种强势的、亢奋的、激进的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心态,这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正因为如此,民众的非理性焦躁情绪和虚骄的民族主义的口号结合起来,再加上知识分子中的国家主义思潮,这三者合在一起,是很危险的。

邱先生,刚才提到了和日本以及德国的比较,您觉得在民族主义方面,两者有何异同?

中国与德、日两国 当年的民族主义的异同

邱震海:当年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有几个特征:第一,它们都是后发的工业国,其他国家已经将世界市场瓜分完毕,它们都有重建世界秩序的冲动;第二,它们都有基于特定历史背景的悲情;第三,它们都缺乏足够的思想启蒙。德日两国民众的性格很相似,都追求精密,对于精密的追求会走向强悍,要求以实力说话。今天中国也开始出现这样的呼声,要求失土复得,要求以实力解决问题。作为学者,我们有义务发出警示之言。

但与德日相比,我们的民族缺乏精细性,性格比较粗放内敛。德日则是外在保守、内在强悍,而我们是外在强悍,内在却比较善良,甚至是软弱。德日当时的民族主义是一致对外,而我们的民族主义是双刃剑,既有对外的冲击力量,也有对内的压力。如果我们能够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本质有一个更加准确的研

判,引发大家的充分思考,将来就能有一个更好的解决之道。

中华文化中缺少以妥协 解决国际争端的习惯

萧功秦:把中国现在的激进民族主义和德日当时的民族主义作比较,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别。首先,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执政党有非常明确的理性目标,那就是实现本国现代化,并根据这一目标来处理国际关系与国内问题;其次,从历史传统而言,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华民族没有对外侵略的传统。而当时的德国和日本不一样,他们的军国主义向外扩张与他们本国历史上的尚武传统有关。

但另一方面,我们与当时的德日确有一些相似之处:第一,我们曾经是落后的大国,又遭受了历史的屈辱与悲情,经历了现代化而突然国力强大了起来,这时,民众心中长期沉淀的屈辱感,就似乎有了宣泄的物质条件,一旦经济出现萧条或陷入经济困境,这时各种社会矛盾积累下来的社会不满情绪,就容易被某些机会主义者利用,他们会把国民情绪引向对外扩张的民粹主义。另一方面,我们又是古老的大国,国民中会产生一种虚骄的盲目的“大国民”的自信,这种虚幻的大国感觉很容易蒙蔽我们的理性判断。再其次,我们的文化中缺乏通过妥协和双赢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国内问题的习惯,你只要和我有不

同意见,就是道德上的邪恶,我和你就是正义和邪恶的斗争,直到把对方彻底消灭。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民族主义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斗争式的成分。我们的执政党是成熟和理性的,但假如我们国家今后一旦面临经济或社会的危机,很可能就会有一些机会主义者,借助民族主义的话语霸权,将理性妥协与温和的政策称为“投降主义”,用“爱国主义”的大旗来汇聚和强化民众情绪,来实现他们的权力目的。

德国曾用福利制度 化解社会矛盾主义之争

邱震海:我很认同您的分析,补充一个具体的例子。19世纪中叶,德国在工业化革命开始之后,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内政斗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主义也在角力。在那几十年中,各个党派的矛盾非常强烈,知识界也陷入纷争。1870年到1890年,俾斯麦首相集中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福利制度,国家和公民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社会上的矛盾得到有效解决,主义之争也相对化解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所有内政矛盾全部消失,一致对外。由此想到,我们的社会矛盾,也需要国家用正确的政策去予以解决。

我想请教您,如何看待当前社会上各种激进的改革主张?

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浪漫 情怀容易产生激进主义

萧功秦：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有两个弱点，一是焦虑感下的激进心态，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在外部压力下形成的，通俗而言是“倒逼”。在封闭的稳定状态中，近代中国人突然发现我们的问题很严重，必须大刀阔斧地解决，这就产生了一种“狗急跳墙”式的以焦虑感为特征的激进主义，这种情绪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戊戌变法时，在危机压力下，一百天内出了近三百多道改革上谕，而这些改革政策却都没有配套措施，结果引起社会不满与抵制，自然是要失败的。在国人身上，与激进主义同时存在的还有一种完美主义的浪漫主义，总是幻想有一个完美的蓝图来一蹴而就，其实改革的特点就是完美主义。目前我们社会上的很多思想流派都是不同形式的激进主义和浪漫主义，或者认为西方体制可以完美地解决一切问题，或者认为回到毛泽东时代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们社会的非理性特征，是在这样的心态下形成的。

未来民族文化：儒家精神、 责任意识和理性精神

邱震海：我们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错过了几个很好的机会，没有对历史做足够的反思。未来我们到底走向何方？精英知识分子应该起到

怎样的作用？

萧功秦：首先，我们应该重新回归儒家宽阔的社会和人文胸怀，这是我们文化传统之中非常重要的基础。其次，在现代公民社会的构型中，各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益组织，和中产阶级的发展结合起来，应该能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力量，来培育理性社会的精神；其三，我们的红色文化中也有积极的因素，就是革命前辈的那种为民族献身的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加上儒家的仁爱精神，以及来自西方现代社会的理性精神，我认为，这三者是我们未来民族文化的建构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我们民族在精神上是否成熟，也可以由这三方面的结合而有了判断标准。

重拾儒家文化需认识 和辨析儒家思想的两重性

邱震海：您如何看待儒家思想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从五四开始，我们一直是通过反封建的口号来推进中国现代社会的建设，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儒家文化？

萧功秦：儒家思想有两重性：一是作为统治阶层的一种官学化的意识形态，体现其为统治秩序辩护的一面；二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价值载体，是中国人特有的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基本的价值观，体现了人文的一面。五四运动中，儒家文化被视为官学的象征而受到批判和打击，这是因为我们

“沉睡的规定”背后是脱离群众

独生子女费每月5元，实行了31年；职工探亲假规定，实行了32年；每月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洗理费、书报费，实行了30多年；防暑降温费，模糊执行了53年……如果不是日历的提醒，我们面对这些陈规旧法“沉睡的规定”时会恍惚“穿越”到了久远的历史年代。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掰起手指头，都可以在生活中发现不少这样“沉睡的规定”，有些甚至极端到荒唐可笑，但这恰恰是客观存在，虽然这种存在有这样那样“合理”的理由。

规定在“沉睡”，而群众的呼声却是一直不绝于耳，甚至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都发出了巨大的声音，但奇怪的是，很多规定以及规定的制定者似乎就是听不见。

是真的听不见吗？其实不见得，更多时候他们是不愿意听见。规定都是我们管理部门制定的，而部门里面制定规定、执行规定并决定规定“睡”或“醒”的是一个个体的人，具体来说就是我们的政府

人员、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他们很多时候可以让一个规定管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乐得轻松自在，反正是前人制定的，即便由于规定落后到导致出了大事，也可一句“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然后再对规定修修补补，把坏事转换成改革的“政绩”。

由于“听不见”改革的呼声，我们就陷入了这样一个循环：老规定由于“沉睡”结果出了大事后，才能等来“苏醒”的时刻，比如食品安全出了大事，才“想起”修改沿用了几十年的食品安全的规定，水安全出了大事，才“想起”修改陈旧不堪的水安全检测标准。而在这个过程中，群众的利益受到极大的伤害，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规定不会说话，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心中更有一杆秤：一个不合时宜的规定“沉睡”有多久，基本可以代表相关部门脱离群众有多远。

（摘自《广州日报》）

没有分清这个两重性，没有把儒家文化的官学层面和人文层面分开。儒家思想中有很多丰富的东西，比如信任感、同情心、仁爱心等等，这

些都是当今社会非常缺乏的精神要素，在儒家思想中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可以供我们挖掘与借鉴。

（摘自《文汇报》）